

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的语境批评法

——以《诗经》和《易经》的诠释为例

林 风^{1,2}, 岳 峰²

(1.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建 福州 350202; 2.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0)

[摘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和古史辨派“疑古辨伪”的精神烛照之下, 阿瑟·韦利应用语境批评法, 对《诗经》和《易经》在内的中国典籍做出远离传统经学的诠释, 使经典呈现出全新的面貌。韦利的语境批评主要是通过舍传解经法、比较民俗法以及重新归类法实现的。这种方法实际上是韦利的前理解及其所处时代精神投射的结果。

[关键词] 阿瑟·韦利; 语境批评; 《诗经》; 《易经》

[中图分类号] I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7) 04-0087-04

阿瑟·韦利 (Arthur Waley, 1888 - 1966 年) 是 20 世纪英国汉学家和翻译家, 在汉学界享有盛誉。他是个语言天才, 精通汉语、满语、蒙语、梵语、西班牙语等; 他著述等身, 一生中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代诗歌集和小说, 撰写了多部文人传记, 80 多篇书评等; 他涉猎广泛, 研究领域遍及中国思想史、绘画史、蒙古史、敦煌变文、中国古代神话、习俗等等。虽然毕生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 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红楼梦》著名译者大卫·霍克斯 (David Hawkes) 就曾评价韦利, 说他的“博学与多产令人震惊”, 因为他出版了 36 部长篇著述, 每一部著作都需要翻阅大量资料, 非具备令人折服的学术修养而不可为。因为这些汉学成就, 韦利曾被授予年度女王诗歌勋章; 《牛津英国文学词典》称之为“诗人及中日文学的权威译者”; 中国学者张弘誉其为“英国第二代汉学家中最杰出的人物”。

作为英国汉学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代表, 韦利是以传统汉学的颠覆者形象荣膺英国汉学界的。这种颠覆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歌翻译的语言风格上, 还表现在他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上。韦利反对用去历史化的方式解读典籍, 提倡把它们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诠释, 这种方法可以称为

“语境批评法”。“语境批评” (context criticism) 这个术语原是文学批评中的一种历史方法, 根据这种方法, 研究者将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时间和地点进行阐释, 从而使文本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经学的面貌。本文将以韦利对《诗经》和《易经》的解读为例, 分析其语境批评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一、韦利汉学研究语境批评法之历史语境

韦利在汉学研究所运用的语境批评法, 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古史辨派“疑古辨伪”思想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古史辨派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 它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潮流中, 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反传统倾向, 本着“疑古”“求真”的精神, 提出新问题, 应用新方法, 以“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文籍”为目标, 对传统儒家典籍做出颠覆性的诠释。

在传统经学中, 对《诗经》的解读都以政教为出发点和归宿。《诗大序》云: “风, 风也, 风以动之, 教以化之。”而“美刺”说又是构建儒家道德伦理的重要手段。《诗经》被赋予教化民风的重要意义和功能。而《易经》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更是被赋予神圣的地位,

[收稿日期] 2017-04-25

[作者简介] 林风,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讲师,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汉学、翻译学; 岳峰,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翻译与中外关系史。

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活水源头。《易经·系辞传》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易理以天地为准则，故能包括统贯天地间的一切道理”。有鉴于《易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 - 1995 年）甚至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即中国在近代没有发展出系统的科学，其罪魁祸首便是《易经》，因为中国人认为世间的一切，已经发生的或者还未发生的，都能够在《易经》中找到根据，而这直接导致中国人“不思进取”，缺乏科学探索和求知求新的精神。

而古史辨派却认为，《诗经》和《易经》本不是什么圣经，其中也没有那许多微言大义。前者不过一部古代歌谣总集，体现的是古代的淳朴的民风民俗；而《易经》，不过只是一部卜筮之书，展现的是原始社会先民生产生活的状况，其中包含一些商周时候的史料，如此而已。史学刊物《古史辨》是古史辨派的主要阵地。1931年，古史辨派代表人物、《古史辨》的创刊人顾颉刚先生将一些讨论《诗经》和《易经》的文章收集起来，作为此刊第三册出版。在此书前言中，顾颉刚就明确提出，“《易》本是卜筮，《诗》本是乐歌，我们不过为他们洗刷出原来的面目而已”，并说自己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打破汉人的经说”，“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要把《易经》“从伏羲们的手里取出来还之于周代”，他认为传统经学是枷锁，而古史辨派要做的就是打破这枷锁，把《诗经》“还之于各诗人”。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以及疑古派其他理论，给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学的根基，使得数千年来关于经典的各种“不刊之论”多遭质疑，从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大多成为问题。古史辨派打破传统经学的藩篱，对后世的经学研究影响巨大。中国哲学学者杨庆中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易学，基本上是在消化他们提出的问题。

在西方世界，韦利是最先对古史辨派理论做出反应的学者之一。1933年，韦利撰写了一篇关于《易经》解读的文章（*The Book of Changes*）发表于《远东考古博物院汇刊》（*Bulletio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上。在此文中，韦利认为《易经》并非哲学著作，而是由农谚、预言和卜辞等杂糅而成的文献，并对《易经》中的一些疑难之处做出远离经学传统的解读。韦利在1937年出版的《诗经》（*The Book*

of Songs）译本也完全摒弃了传统经学之中的德教说与“美刺”说。韦利以“语境批评”的方法，将《诗经》与《易经》置于两书成书的年代，即商周时期及稍晚一些的时代，考察其原初意义，向读者揭示经文中所蕴含的中国古代先民的风俗人情等。

二、韦利汉学研究的语境批评法

韦利语境批评式的经学研究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手法实现的，即舍传解经法、比较民俗法以及重新归类法。

（一）舍传解经法

典籍有经传之分，《易经》传文譬如《十翼》，《诗经》传文譬如《毛诗序》等。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就“离经叛道”地指出自己的研究目的“于《易》则辨明《易十翼》的不合于《易》上下经；于《诗》则辨明齐，鲁，韩，毛，郑诸家诗说及《诗序》的不合于三百篇”，认为“它们解释的错误和把自己主张渲染到不相关的经书上”，同时表明要“服从真理”而打破这些附会的传文的桎梏。

韦利明显深受这种研究方法的影响，在典籍解读的过程中完全把传文排除在外。我们知道，诗序是进入《诗经》的传统门户，而小序在“美刺”教化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譬如《诗经·甘棠》小序就解释此诗为“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即赞美召伯因其教化之功而名垂青史；《诗经·载驱》小序则谓此诗“刺襄公也。无礼义故，盛其车服，疾驱于通道大都，与文姜淫播其恶于万民焉”，即讽刺襄公无礼义且与文姜淫乱。但韦利在翻译《诗经》的时候不但删除了《关雎》题解之后的大序，还一并删除了《诗经》三百零五篇中每一篇的小序。这就等于同时删去了史事附会，将进入《诗经》的门户堵死，而重开了文学、民俗学以及文化学的新门户。这就引领西方读者摒除先人之见，为读者展现一个文学和文化学的世界。在韦利的译笔下，原为“刺”襄公的《载驱》被诠释为描写女子乘车出嫁的快乐浪漫景象；原为“美”孝子的《凯风》、“美”召伯的《甘棠》，以及“美”周公的《伐柯》都成为婚姻之诗。而这与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 - 1897 年）和阿连壁（Clement F. R. Allen, 1844 - 1920 年）两位译者遵从传统经学注疏的诠释迥然有别。

韦利对《易经》的诠释亦是如此。传统易

学中,《十翼》向来被视为《易经》的标准解释。到了汉代,经学家更是直接把《十翼》中的《彖传》《象传》分附于对应卦爻辞之下,现在的《易经》通行本依旧保留着这样的体例。这就是所谓的以传解经,牵经就传。虽然理雅各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文原意,在翻译的时候,将传文从经文中分离出来,不过传文仍然得以保留并翻译,理雅各的诠释实际上并没有脱离传统经学的轨道。而韦利在诠释《易经》的时候则完全忽略了《十翼》,在他解释《易经》的长篇文章中,并未把传文作为诠释的对象,甚至一次都未曾提及或者评论。由此,《十翼》中对经文之微言大义的阐发被果断否定,取而代之的是远古先民生产生活情形的展现。譬如《咸》卦九四爻爻辞“憧憧往来,朋从而思”,根据传统易学,这句话是说友朋意志通感,倾心相从。而韦利认为,这句爻辞事实上是一句预兆性质的谚语,意思是“如果你感到坐立不安,这意味着你的朋友正顺从你的思想”。又如《解》卦九四爻爻辞“解而拇,朋至斯孚”,根据传统训释可以解释为“像舒解你大脚拇指的隐患一样摆脱小人的纠附,然后友朋就能前来以诚信之心相应”。在韦利的笔下,这句话却成为战俘被砍掉脚拇指的古代习俗。

韦利通过这种舍传解经的方式,摆脱传统经学的道德教化的“附会”之说,将《诗经》和《易经》以古代先民原生态生活的全新面貌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二) 比较民俗法

韦利在汉学研究中对民俗学的方法情有独钟。他曾在《诗经》的前言中明确表示自己对葛兰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年)的代表作品《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Fetes e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表示推崇。葛兰言在这本书中运用法国社会学和西方民俗学的方法对《诗经》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国风》诸篇描写、记录的是中国古代节庆、歌舞、求爱以及劳动生活等民俗。而在韦利看来,葛兰言“洞悉到了《诗经》的真正本质”,他因此继承了葛兰言民俗学的思路。为了论证自己民俗学诠释的正确性,韦利常常将自己在典籍中所解读出来中国古代民俗与世界各地的民俗进行比较,这就是比较民俗学的方法。比较民俗学认为,不同的民族之间虽然在语言、制度等方面不尽相同,但有许多民俗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韦利就利用这种相通性,

对典籍进行与传统注疏判然有别的诠释。

《诗经·将仲子》小序云:“《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意思是此诗是用以讽刺庄公没有制止其弟的失道行为,听之任之,最后迫使其出奔之事。但在韦利的译笔之下,原来的“刺”诗被诠释为爱情诗,描述的是仲子逾墙与心爱女子幽会,女子怕被父母兄弟及邻居发现,请求仲子莫攀墙折枝,语气中充满了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矛盾与无奈。韦利从比较民俗学的角度解读诗中主人公的行为。他认为,中国和欧洲一样,在农村,男子常常在夜里幽会情人,或逾墙或破门悄然而入,避免惊动女方父母和左邻右舍。每次幽会,尽管依依不舍,但是拂晓之后也只能分别。他提到,在英国民歌和民谣中就有很多类似情境的描写。

《易经》的《无妄》卦六三爻辞云:“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根据传统易学,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不妄为却也招致灾难:譬如有人系拴着一只耕牛,路人牵走据为己有,邑中人家将遭受诘捕的飞灾。”九五爻爻辞云:“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意思是“不妄为却偶染微疾,无须用药而将有自愈的欢欣。”但是韦利却认为,这两句话描述的是古代民间用“替罪羊”的方式驱邪驱魔的习俗。“无妄之灾”是指由名为“无妄”的瘟神引起的灾祸,“牛”是“替罪羊”,人们把象征“无妄”的草药系在牛身上,把牛送出村庄,路人就会将疾病带走。这样一来疾病就不药而治,这就是爻辞所言的“无妄之疾,勿药有喜”。韦利同时列举其他文化中的类似习俗,比如,闪米族(Semites)族有类似的驱瘟仪式,非洲人也有用泥塑做“替罪羊”的风俗,等等。

(三) 重新归类法

韦利的分类重编法主要体现在对《诗经》的研究上。众所周知《诗经》305篇按照音乐类别分类编排,依次为风、雅、颂。但是韦利却另辟蹊径,完全打乱原有的编排顺序重新归类,按照其认为的诗歌主题将《诗经》分为求爱诗、婚姻诗、勇士与战争诗、农事诗、祝祷诗、欢迎诗、燕饮诗、族人燕饮诗、祭祀诗、歌舞诗、宫廷颂诗、宫廷传说、建筑诗、田猎诗、友情诗、道德诗、哀怨诗17类。在《毛诗》中,明确标明为“美”“刺”诗的有152篇,在韦利的笔下,这152篇中有120篇被按照文学和文化学的观点进行理解并分类,都被看作与政教无关的诗

歌，占总数约八成。韦利对部分“美”诗的重新分类情况如下：

表1 韦利对《毛诗》中部分“美”诗的分类

《诗经》篇目	所属原类别	小序所注明的类型	韦利分类
凯风	国风·邶风	美孝子也。	婚姻诗
何彼礼矣	国风·召南	美王姬也。	婚姻诗
江有汜	国风·召南	美媵也。	婚姻诗
甘棠	国风·召南	美召伯也。	婚姻诗
木瓜	国风·卫风	美齐桓公也。	求爱诗
缁衣	国风·郑风	美武公也。	求爱诗
九罭	国风·豳风	美周公也。	求爱诗
驺贖	国风·秦风	美襄公也。	田猎诗
狼跋	国风·豳风	美周公也。	祝祷诗
庭燎	小雅·鸿雁之什	美宣王也。	欢迎诗
定之方中	国风·邶风	美卫文公也。	建筑诗
鸿雁	小雅·鸿雁之什	美宣王也。	勇士与战争诗
皇矣	大雅·文王之什	美周也。	宫廷传说
破斧	国风·豳风	美周公也。	宫廷颂诗

由此可以看出，原来与政治紧密相关的篇目在韦利的笔下成为对中国古代淳朴民风民俗的描写。韦利这种按照诗篇主题进行重新分类的方法不论是在《诗经》学史上，还是在《诗经》翻译史上都是前无古人的。这种分类法对西方甚至是中国国内的《诗经》学研究都有所启发。

三、结论

韦利用语境批评的方法，将《诗经》和《易经》拉下圣坛，试图还之以淳朴的面目。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来看，这是由诠释者的前理解决定的。冀爱莲认为，在当时的英国，反犹太的情绪仍未散去，拥有部分犹太血统的韦利总是有意无意受到边缘化，加之其性格清冷，离群索居，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远离传统汉学，另辟蹊径。而在五四新文化思潮激荡下的古史辨派经学观可以说极大地契合了韦利的这种“叛逆”精神，因此他打破传统经学附会，考察其原始意义，重现其原初面目，揭示其本真的精神。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中国“疑古辨伪”的时代精神在西方世界的投射。韦利的这种汉学研究方法尚有争议，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为汉学研

究的语境批评派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对后来的西方汉学研究，尤其是易学的研究做出突出贡献。后来的孔理霭（Richard Alan Kunst）、茹特（Richard Rutt）等易学家都沿着韦利开辟的道路，走出一片新天地。

[参 考 文 献]

- [1] Waley, Arthur. *Book of Changes* [J].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33(5).
- [2] Arthur Waley. *The Book of Songs*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9.
- [3] 顾颉刚. 古史辨: 第2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4] 黄寿祺, 张善文. 周易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5] 冀爱莲. 翻译、传记、交游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考辨 [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 [6] 李学勤. 毛诗正义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7] 李玉良. 《诗经》英译研究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 [8] 杨庆中. 论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2).

[责任编辑 薄 刚]